

论质性研究与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发展

李佳宝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4)

摘要: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命题,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社会学领域的一门应用社会学,也有实现本土化的现实要求。通过对既有文献资料的研究,进行逻辑分析,结合专家访谈,认为有别于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强调参与理解和统整归纳的质性研究有助于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发展。中国体育社会学应以质性研究为本土化进路,把握本土现实、解决中国问题、构建本土理论,回归社会学的人文传统。

关键词:质性研究;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7)02-0048-04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ndigenization of Sport Sociology in China

LI Jia-bao

(Dept. of Graduate,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topic, sport sociology as a branch of sociology, an applied sociology, has a real need to be localized. Through the study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expert interviews, we can see that it is different from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emphasizing the participation to understand and the complete conclus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helpful to the indigenization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ology in China.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sports sociolog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grasp the local reality,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a, build the local theory, return to the humanities tradition of sociology.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sport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sociology

体育社会学是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以推动体育与社会合理发展的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演进与其母学科社会学紧密联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恢复重建”以来,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但是,如果要将西方体育社会学为我所用,就不仅仅是院系的建立、学会的成立、期刊的创办和著作的发表——当然这些阶段性的学科成就不可抹杀,更需要一种本土学科的再建。质性研究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本文将从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发展的要求出发,分析质性研究的特点,以期发现和诠释其作为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进路的重要作用。

1 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诉求

1.1 建立学术话语权

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至今,无论是理论话语还是

方法规范,几乎可以被称为“西方体育社会学”,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教材大多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体育社会学的简单移植、研究议题大多来自西方范畴、研究方法套用西方框架结构、学术表达取材于西方话语体系、学术标准更是以西方为模范准则,形成了中国体育社会学“言必称西方”之形势。

但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具有不可否认的地域性和历史性。人类社会虽然有诸多共性价值和普适理想,但是不同国家与民族、不同文化与历史锻造了不同的人类生活世界。简而化之,将西方经验嫁接到中国社会是不现实和不科学的。这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过于强调与国际接轨,为了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丢掉了中国体育社会学的自主权,让中国学者在有关中国体育发展的问题上反而丧失了话语权,面对并参与创造了一个没有“中国味道”的学术世界。这种“学术殖民”把根植于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号称“普世”的研究理念强加于人,掩盖了其背后学术不平等的实质。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在国际体育事业中颇具影响的大国,现有的体育社会实践理应产生相应的中国体育社会学。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然而当今学界却难觅中国“好声音”,这与中国体育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总之,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既是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原因,也是结果。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需要摆脱“协洋自重”的秉性,摒弃对自我的矮化和对强者的迷信,扎根中国实践,构建学术表达、调适西方理论、提出中国论点。

1.2 回应中国体育问题

建立学术话语权并非要与西方体育社会学对立而持,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体育社会学可以更好地回应本国体育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哪怕引进最新颖、最先进的解决路径和方法也面临因“拾人牙慧”而“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这种学术沟通的方式遗忘了中国体育的现实需求,让中国学者变成了中国体育发展实践“最熟悉的陌生人”。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近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不是为了验证西方,而是期待自己变得更美好。

回看和展望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可供学者们深度探究的议题十分丰富。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交汇、矛盾频发,可谓是一座体育社会问题的“宝矿”。虽然大多数的中国体育社会学学者“以天下为己任”、颇具问题意识,但受限于西方框架,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阐释中进退两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很多体育决策和发展理论往往是由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提出,而社会学者则是诠释和总结。这并非仅是所谓“体制”之因,这与中国体育社会学用“拿来主义”收获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国内体育实践格格不入有关。

综上,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绝不能仅限于“引进”,而是要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体育事业而言,迫切需要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

1.3 走出统计“牢笼”

中国体育社会学伊始是定性研究为大流,但随着对母学科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以数理统计为代表的“量化”研究喧嚣尘上。这一量化研究的浪潮同样来自西方——至今,向自然科学看齐仍然是大多数

西方社会学家的主流。“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1]

科学是发现真理的手段,对“科学即测量”的观点却不敢苟同。事实上,在“学术规范化”的口号下,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越来越陷入方法论的迷思,对数字和数据的苛求超过了对真正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追求。甚至在学界中出现了科学的误读,将“科学”研究直接等同于“量化研究”,将完美的量化模型作为科学的最高表述和衡量研究成果的标准。

量化研究在体育社会学领域取得可供学术共同体支持和交流的硕果之余,其相对的局限性也不可忽视。数量化导致学术研究与体育实践脱节,其解释力和预测力并非一骑绝尘。中国体育现实庞杂,很多实践经验都存在多因多果相互交织作用的情况,如果没有对整体社会经验的把控,可能会得出简单而失常的结论。尤其是当这些错误的结论背后是眼花缭乱的数理模型时更具蒙骗性,甚至量化研究所标榜的“理想化”模型和“价值中立”学术观都失准于实际学术现实。

总之,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不可能如自然科学般被精准分析测量,在没有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全面理解的浮萍之上,量化研究将走入中国体育社会学贸然进入西方学术体系却难寻解决中国问题之道的困局。

2 质性研究何为

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并非要构建一套强调民族特殊性的体育社会学,而是要求对既有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本土化发展的综上诉求归根结底是掌控中国体育历史与现实,建立对中国体育问题和矛盾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继而更好地助力中国体育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树立学术话语权。质性研究由于其独特“气质”不失为一种本土化的路径。

2.1 质性研究的特征

质性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

动。^[2]至今,质性研究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民族志、扎根理论等一整套方法体系。本文认为,质性研究可集中被归纳为两个特点:参与理解和统整归纳。

参与理解是指质性研究注重在自然情境中研究者的亲身参与并对所获得的各种相关信息进行理解与诠释。“参与”不是简单的“参加”,需要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界限,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的一面必须加以考虑。“理解”要求研究目的不仅仅是对现象的“深描”,而是要解释和理解其意义。通过对语言和文本的分析、反思和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意义,这就需要“参与”而来的“当事人”视角。质性研究强调过程而非结果,探究而非判断,质性研究者是一块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的海绵,直到对所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和理解。

统整归纳是指质性研究视野的整体性和逻辑思维的归纳性。质性研究者要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去考量,同时把这个研究整体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进行深入而长期的研究。统整也强调“过程”的重要性,跟踪“自然情境”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归纳”的特征表明了参与、理解和统整后不断发现关联性的过程,作为学术至高追求的理论提出也产生在“归纳”中。

同时,社会学所倡导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一观点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从回归人文传统而言,质性研究也应该成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路径。尤其是质性研究的参与理解和统整归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将心比心”、“天人合一”的一致性;“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3]

中国体育社会学现有的质性研究报告量较少,且大多以“质性研究”为名的学术文章借质性研究之名行学术不规范之实,质性研究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学术地位和应用规范需要重新被强调和梳理。

2.2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

相较于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在中国体育社会学的领域可谓站稳了脚跟。关于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讨论经常陷入孰优孰劣的争辩,本文认为,二者的关系只是“范式”迥异所带来的不同而已。“范式”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可以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基

本认同并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4]

量化研究的支持者认为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存在可被测量的、以因果关系为代表的相关关系;而质性研究的传道者则认为由众众构成的社会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必须通过研究者的“当事人”视角在具体情境中才能被理解。

量化研究师从实证主义,运用实验、测量、调查等统计量化的方式来收集和分析资料。强调研究设计中的研究假设和理论先导,其研究目的主要在于验证研究假设。量化研究结果的一般价值取向是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用数字和数据支持研究结论。质性研究遵循解释主义,将整个研究过程处于相对自然的情境中,研究设计和非必须的研究假设可以随时被推翻,资料收集和分析同步进行直到信息的饱和。质性研究的研究结论从原始资料中产生,被认为是研究者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研究结果不具有固有学术偏见所坚称的客观性、推演性和预测性。

由此可见,量化研究以演绎为上,而质性研究以归纳为主。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理解和统整归纳与量化研究要求的客观实证和演绎推导形成鲜明对比。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碰撞,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显著不同、更是研究理念的差异,是“范式”的不同。

2.3 质性研究与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在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很多价值非凡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理想都源于学术前辈的定性研究。质性研究曾被译等同于“定性研究”,但是这二者有着明显区别。

定性研究主要用思辨的方式对研究现象进行解释和讨论,不要求研究者自己进入实地展开研究并提供第一手资料。^[5]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事实中,很多学者也会提供一些既有文献素材或统计数据资料来作为观点的论据,但并不需要展开实地调查。思辨而无需调查是定性研究区别于质性研究的关键。质性研究的理解归纳虽不排斥研究者的前见,但更看重情境中的当事人如何意义自己的言行,实地调查而来的第一手资料是质性研究的根本。所以,二者的共通之处是“解释”:定性研究具有“思辨”和“解释”的特色,而质性研究具有“解释”和“实证”的特点。

在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中,定性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皆不可或缺。但是考虑到学科发展所必须突破的本土化瓶颈,质性研究是现阶段值得信任的本土化进路。

3 作为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进路的质性研究

在中国体育社会学能更好地满足体育实践需要、解决本土问题、对体育事业的进步有所助力之时,就可以认为中国体育社会学较好地实现了“本土化”,否则就仍然只是具有西方特色的教科书体育社会学。

质性研究有利于体育社会学者把握本土现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中国为“本心”,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包括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后奥运”时代的体育发展事实,必须加以重新的梳理。

质性研究有利于体育社会学者发现本土问题。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性。研究议题的选择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和立场,研究中所使用的关键词语和概念,无不隐含着价值预设。西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霸权首先体现在对社会事实的筛选权,他们决定了什么样的事实成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并在学科体系中决定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反思现有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当下体育社会学的很多理论和概念十分具有自明性,但其背后是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参照,而在“中国化”的强硬对照中,很多概念和理论被错误地广泛应用。

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需要对本土体育现实经验有真实了解和理解,坐在书屋中是发现不了“真问题”的,甚至可能被蒙蔽了眼睛。质性研究所特有的统整归纳的过程理解方式有助于学者全面把控中国体育事实和经历,并从中发现“真问题”,进而解决“真问题”。质性研究强调对具体个案长期而深入的探究,当研究者深入“田野”,一定会发现大量无法用西方“普适”概念和理论去界定和分析的真实信息和因素,如此,就需要一个更具有本土化特征的话语体系来贯穿这些信息和因素,就必须根据中国语境进行转化,以恰当的汉语概念进行表达或重新定义。通过质性研究,研究者可以强化对中国体育问题和现实经验的重新概念化,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过度依赖。

质性研究有利于体育社会学者构建本土理论。理论与方法都不应该成为限制研究者想象力的牢笼,虽然质性研究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但是高质量的质性研究并不停留于此,而是期待提出本土化的理论线索、与前辈或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与中国体

育发展切身相关的重要议题,不一定在西方学术视界中也是重要的,盲目跟从只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他人的价值预设和研究领域,只有了解中国,才能发现中国。只有站在中国体育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才能对事关本民族的体育问题保持敏锐,才能在学术实践中开拓创新。

综上,本文认为质性研究有理由成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进路。

4 结论

本土化发展并非强求在学科的“普遍性”和现实的“特殊性”之间争个高低,而是强调在二者不可消弭的交互基础上的学理态度。建立学术话语权、回应中国体育问题、走出数理统计的“牢笼”是中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的诉求,其最终落脚点是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促进中国体育事业的进步。有别于推演、预测的量化研究和解释、思辨的定性研究,以质性研究方法群来收集和分析资料可以有效地收获本土体育事实的第一手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中国体育的“真问题”,成为本土化进程的基础;质性研究所具有的归纳特质有助于提炼概念、形成体系、建构理论,不仅有利于“真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统整下获得解决,也有助于国际体育学术话语权的建立。质性研究的人文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代社会学的人文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妙。质性研究理应成为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本土化进路。

参考文献

- [1] 哈拉兰伯斯. 社会学基础[M]. 孟还,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60-61.
- [2]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2.
- [3] 应星.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N]. 光明日报,2008-10.
- [4] 石英. 质性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J]. 人文杂志,2013(4):101-107.
- [5] 陈向明. 从“范式”的视角看质的研究之定位[J]. 教育研究,2008(5):30-35,67.

[责任编辑 魏 宁]